

“新民”与 强 国

——严复、梁启超“新民”学说评析

田 文 军

“新民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思潮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新民说”的产生、内容、价值、实质等层面对其进行了评析。既肯定其历史的价值,又揭示其阶级局限;力图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论释我们以教育为本,科技立国,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历史起点和现实要求。

“新民”学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梁启超一类维新派人物思想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曾把“新民”视为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根基和前提,声称“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在其“新民”说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当历史曲折地发展到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到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事关民族振兴的大业,提出教育为本,科技立国的时候,重温一下维新派人士“新民”思想的得失,也许会从历史的回溯中,使我们更加坚定今天的信念。

—

“新民”学说的形成,是同中国近代历史跳动的脉搏联系在一起的。1840年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清政府的“金锁铜关”,中华民族从此步入了苦难的近代历程。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军队再度失利,败给了东方的一个小岛国。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使清政府向日本赔偿巨额经费,失去了台湾和辽东半岛等大片国土,并且使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开始得逞。在日本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之后,长城以北,长江流域,山东、云南、两广的大片土地又先后变成了沙俄、英、德、法等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从而更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使中国人民进一步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的“自强新政”的破产,打破了洋务派办洋务,兴实业,强国强民的梦想。面对商战论、兵战论、洋务思潮的相继破产,国家的大好山河被帝国主义“瓜分豆剖”,古老的中华民族受人宰割欺凌的严酷现实,爱国的志士仁人忧心如焚。“世间无物抵春愁,合问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的诗句真实地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悲愤心情。亡国灭种危机的加剧,唤醒人们对复兴国家民族道路的新探索、新思考。人们已经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从一个层面上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已无法达到复兴国家民族的目的;人们开始构思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全面变革的蓝图与目标。

梁启超曾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抚腕言‘维新变法’”。^①人们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保教”的强劲呼声，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维新思潮，使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物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新民”说即是维新派代表人物作为其维新变法主张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来的。这种“新民”说的基本目的，就是要通过革新教育，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新的人才，以担负起建设和保卫国家，复兴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

严复在深入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总结在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中国军队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时，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国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感受到“新民”的必要。在严复看来，中华民族步入近代以来，积贫积弱，饱受欺压，中国的军队在战争中屡战屡败，表面看来，是因为中国科技落后，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不如西方国家；从实质上看，则是因为中国文化落后，因为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高。在具体谈到中国军队的素质时，严复曾经说过：“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则蚁附蠹屯，授之以枘格不操之利器，曳兵而走，转以奉敌；其一时告奋将弁，半皆无赖小人，觊觎所支饷项而已。至于临事，且不知有哨探之用，遮葺之方，甚且不识方员古阵不宜於今日之火器，更无论部勒之精详，与夫开阖之要眇者矣。即当日之怪谬，苟记载其事而传之，将皆为千载笑端，而吾民靦然固未尝以之为愧矣。”^②在严复看来，由一些不懂得现代的军事技术，只知墨守陈规，不知爱国为民，只知为己而告一时之奋勇，愚昧贪婪，不守纪律的将士组成的军队，是注定要失败的。严复进而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总体上看，中国“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③民族在体力和文化素质上已不足以同西方的列强抗衡；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弱者将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这是必然的。“民力”“民智”“民德”，是一个民族素质优劣、国家力量强弱的标志，“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④这种认识，使严复极力主张“新民”，把革新教育，培养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看作是治世之要，强国之本。

梁启超也是极力主张“新民”的维新派代表人物，他也把“新民”看作谋求国家民族强盛的基础和前提。他曾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固，而身犹能存者；则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⑤在梁启超看来，在中国要出现“新国家”“新政府”“新制度”，必须从“新民”开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长期致力于变法图强的事业，而又始终没有获得大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未能留意于“新民之道”。为此梁启超专门撰写了《新民说》，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并详细地论述了自己所理解的“新民之道”，论释了“新民”的涵义、方法，内容，使维新派人士的“新民”主张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但不论是严复主张和追求的“国威”，还是梁启超讲的国家的“安富尊荣”，本质都是同一的，维新派人士主张“新民”，其动机和目标都是近代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强国。

二

梁启超主张的“新民之道”，最基本的一点是强调国民人人都有一种自新意识。“新民”不是仅“新”某一个人，而应当使整个民族人人“自新”。他说：“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之行，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

民之谓也。”^⑥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国民都具备一种自新意识，才是真正“新民”；因为只有当国民具备这种“自新”意识的时候，才能够改变人们对国家大事漠然，或在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面前“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⑦由国民的“自新”而致使国家兴盛。

“新民”是要使国民“自新”，具体来说即是要“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严复在他的《原强》中曾说“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并以为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所谓“鼓民力”，是主张民众强身健体。严复以为，现代科学如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已经证明，人的智力同人的体质是密切联系的。有了强壮的筋骨，才可能有超人的智略。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强盛的根基之一即在于“民之手足体力”。中国古代有“射御之教”，目的即在于“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近代西方更是注重“操练形骸”，讲究饮食和优生，致使西人体格强壮，精力充沛。中国近代则不然，人们吸食鸦片，女子缠足，结果是国人体弱，使国家民力大衰。所以严复认为，要强国需先“鼓民力”，“鼓民力”则需禁止吸毒，禁止缠足。“是鸦片、缠足二事不早为之所，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⑧不确立科学的生活态度和观念，增强人们的体力，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富国强民就没有基础，就只能流于形式，托之空言。

“开民智”是要全面地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严复认定，近代西方国家强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智力发达，具有一批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谈到近代西方科学昌明时他说：“是以制器之备，可求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弟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窍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⑨“开民智”为国家“富强之原”，在中国也只有“教民知学”，启迪和开发民族的智力，中国才能够自立于强国之列。

严复主张的“新民德”，是要通过思想文化教育，更新国民的价值观念，思想品德，摆脱传统的三纲五常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严复十分称道近代西方文化中的平等观念，他认为，在西方是因为平等观念使得“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他指责中国文化中强烈的等级观念，认为这种观念弱化了国民的自主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他说：“夫上即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保持之也”。^⑩自主意识的弱化，使得人们不能够“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敌”。^⑪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极其不利和危险的。所以严复认为，不“新民德”，中国亦无强盛之日；要求国家强盛，则必须“新民德”，培养和强化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

严复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新民”的具体内容，把这三者都看作是强国的根基，但他以“开民智”为国家富强之原，认为在中国最急切地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智”问题。他说：“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⑫在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启民众智力；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既无法“疗贫”，也无法“起弱”，即缺乏富强之原。严复这种“新民”思想，亦可谓是主张治“贫”，治“弱”，必先治“愚”。

梁启超主张的“新民”，同样是要解决民族的“民力”“民智”“民德”问题。梁启超认为，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要自强，所面临的具体工作一是“内治”，一是“外交”。对于“内治”，人们多议论某人“误国”“殃民”；多指责政府的“失机”，官吏的“溺职”，以此作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由，其实不然，这种根由尚属表层的，而非深层的。因为中国的政府是由中国人组成

的，无能的官吏也是中国人中的一分子，政府“失机”，官吏“溺职”，说明近代中国人文化思想素质的低下。他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⑬在一个“民力”“民智”“民德”低下的民族中，是难以选拔出精明干练的官吏，组织起政府，处理好国家内部事务的；即使有所谓“贤君相”，以低下的“民智”“民力”“民德”，同样难以拯救民族的贫弱。要处理好“外交”问题，“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扰，同样必须解决民族的“民力”“民智”“民德”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都必须“新民”。这种认识使梁启超断定：“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⑭“言新法”而未睹实效，是未行“新民之道”。要抵御外辱，也只有“新民”。因为“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⑮维新派人士，意识到在近代中国，要强国即需“新民”，把“新民”看作是强国之本；并将“新民”的具体内容定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感受到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身体素质的极端重要性，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鸦片战争以来，不少具有爱国热肠的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亡图存的路径，或主张学西方的船坚炮利；或主张学西方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把从不同的层面上学习、吸收西方文化，视为强国的灵丹妙药。但在维新思潮形成以前，人们的救亡图存理论中，都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在中国改造中国文化的主体，培育一代新人，把“新民”视为强国之本。应当说是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促进人们深化了对救亡图存路径的认识，使严复、梁启超一类维新派人物清醒地认识到了近代中国对于“新民”的迫切需要。维新派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主张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具体涵义当然不会超越资产阶级改良派不触及封建社会根本制度的立场和追求，具有其特定的阶级属性。但他们主张“新民”，确又触及到了中国步入近代之后，我们的民族急需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使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中，仍然需要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人们的思想品德，培植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待维新派人士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则不能否定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

三

怎么样“新民”呢？或者说怎么样“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呢？严复的主张一是摒弃旧学，一是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

在维新派人士中，严复对于中国旧学的批判是较为深刻的。在严复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少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无用之学。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辞章、考据的学问，也批判过宋代的义理之学。认为这些学问之所以无用，是因为这些学问“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产生这种无用之学的根由，严复认为从思维方法上看，一在于“师心自用”，一在于“无实”。他批判陆王心学时说：“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齟齬否？又不察也。向壁虚造，顺非而泽，持之似有故，言之若成理；甚远也，如驪山博士说瓜，不问瓜之有无，议论先行蜂起”。^⑯这

种“师心自用”的学问，不是源于实际，又不验证于外界的客观事物，不能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这样的理论，貌似高深，却无实际的用处。严复在批判心学的同时，对宋明道学中其他各派也进行了批判：“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地声颜，距人千里。灶上驱虜，折箠笞羌。经营八表，牢笼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①这种“无实”之学，除了教人们摇头晃脑，空论心性，或叫人们死记硬背，作八股文章，以为谋取私利的敲门砖之外，也毫无用处。心学“师心自用”，道学“无实”；其流传，只能是使人们“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误国误民。因此，要在中国“新民”，严复认为首先要抛弃旧学，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提倡科学的实测之学。

同时，严复认为要“新民”，还必须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严复曾留学英国，是维新派人士中直接地领略过西方文化的人物。他对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对于“新民”的重要作用相当的自觉，把接收容纳西方文化看作是在中国“开民智”的重要途径。他曾经说过，废八股，兴西学，“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他认为，尽管在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中，中国是失败者，中国人民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恨之入骨，但正因为失败，才必须学习人家的长处，并以日本为例说明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认为中国人亦必需如此，要“制人”“存国”，亦宜痛下决心，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

严复不仅主张“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而且身体力行，努力在中国传介西方文化。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论》等近代西方的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由于严复把西方逻辑理论的发达看作是科学昌明的重要原因，还把约翰·穆勒的《名学》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译介到中国来，主张在中国改变学术方法、思维方法落后的状况，避免由于不注重逻辑方法而导致的“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多病”的后果。

严复主张通过吸收西方文化来“新民”，但严复并非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民族文化传统在他的心目中仍有相当地位。严复也不是一个“中体西用”论者。他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体有用，西方文化的近代特质即在于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学习西方文化，不能割裂其体用关系。他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主张在中国要“新民”，即须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在中国亦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文化建设道路。严复主张的这种“新民”途径，在中国并没有成为现实，但仍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某些历史要求。当然，严复晚年的思想变化较大，他由一个熟知西学的人物蜕变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极力维护中国传统的旧文化，把封建的“先王教化”看作是中国存在的“命根”和希望；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努力为维护封建的“纲纪彝伦道德文章”开辟讲坛，体现了他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但这并不影响他早年关于“新民”思想的价值，而只是以一种悲剧性的思想结局，向我们折射了中国近代复杂的文化斗争和社会矛盾。

梁启超对于如何“新民”的理解更具备理论的形态。他认为“新民”需正确处理好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为了“新民”而接受外来文化，这并不是要人们“尽弃其旧以从人”，而是既要保存民族所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又容纳外来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前者他谓之“淬厉其所本无而新之”，后者他叫做“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启超主张发扬民族文化的固有传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自立于世界，是因为有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质，有自己独立的国民精神；对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只能够“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原”。^②只能让其留存，并使其发达。若是丢弃了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精神，则失去了一个民族“自新”的根据。他主张吸收外来文化，

是因为他意识到近代中国文化确实落后了，缺乏近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和内容；而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是难以强国的。所以他说“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⑨梁启超在其如何“新民”的主张中，似乎注意到了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两种有片面性的态度：一是固守旧的文化传统，拒绝接收外来的新文化；一是全面地接收外来文化，丢弃本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他说：“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⑩在梁启超看来，墨守陈规的国粹主义者不能“新民”，数典忘祖的全盘西化也不能真正“新民”。要“新民”必须在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容纳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形成新的民族文化；以这样的新文化“新民”，才能真正培养出“新民”来；由这样的“新民”治理建设自己的国家，才有可能达到强国的目的。这种思想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很有价值的文化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地理解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仍然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新民说”是维新思潮中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思想并不限于严复和梁启超的学说。康有为倡导维新变法，谭嗣同主张“冲决网罗”，实际上都主张“新民”；“新民”是维新派人士企求强国的重要措施，也是维新派人物一致的追求。为了革新教育，为了“新民”，他们批判旧学，译介西学，为新的民族文化的孕育诞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建自己的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一定的思想土壤。但是，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们又未能以自己的“新民”理论和实践，培养出能够担负起挽救中华民族危难的“新民”来。其中原因甚多，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们基于君主立宪的立场，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实际，能够指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解决民族、民生问题的思想武器；后来，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人物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当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才武装起民族的“新民”，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上了自强自立的道路。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巨人般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我们的经济、文化相较于先进民族仍然比较落后；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和充满矛盾斗争的世界上，我们的民族要利用机遇，迎接挑战，重要的手段仍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新民”仍是我们今天“强国”的基础和前提。所不同的是我们所要求的“新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现代科学文化培养四化人才，“强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义蕴同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对历史的回溯，却应坚定我们以教育立国，以科技兴邦的信念；促使我们科学地理解现实的振兴中华的目标和任务。

注释

-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 ②③④⑧⑨⑩⑪ 严复：《原强》。
- ⑤ 梁启超：《新民说·叙论》。
- ⑬ 严复：《与人〈外交报〉主人书》。
- ⑥⑫⑭⑮ 梁启超：《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 ⑯ 严复：《救亡决论》。
- ⑰ 严复：《〈穆勒名学〉按语》。
- ⑱⑲⑳ 梁启超：《释新民之义》。